

# 歌德 《罗马哀歌》中的 性爱主题 与同时代的德国背景

赵蕾莲

**摘 要:**《罗马哀歌》是歌德在古典文学时期的创新之作。他将性爱体验纳入古罗马爱情哀歌的传统并将性爱升华。他冲破德国同时代的道德禁忌,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参照演绎性爱主题。他把基督教对性爱传宗接代目的的普遍理解变成单纯的欢愉。他还创新地改变哀歌多愁善感的普遍特征,赋予其爱情哀歌乐观幸福的基调。他反映这一现实问题:同时代的性爱文学在社会道德规约的束缚下陷入困境;人类的性爱也受性病困扰。古今性爱文学与人类性爱环境迥异。

**关键词:**性爱; 爱神; 爱的升华; 性病恐惧症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 德语系 教授 博士 北京 100872

**中图分类号:** I51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871(2017)03-0114-19

### 导言：歌德的意大利之旅、《罗马哀歌》及其研究现状概述

歌德 1786 年 9 月 3 日悄然离开魏玛，化名莱比锡画家莫伊勒(Möller)到意大利旅行。此举有很多起因：首先，作为魏玛公国的枢密顾问，歌德谙熟其经济社会的衰败景象，宫廷生活令他感到压抑。其次，他父亲四十年代的意大利之旅吸引他。再则，意大利人奔放的民族性和“爱都”罗马召唤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歌德想尝试发展个性，更坚定自己走文学艺术道路的信念。他认定，其天职使命是文学艺术，而非政治或自然科学研究。

克内贝尔(Karl Ludwing von Knebel)翻译的古罗马爱情哀歌诗人的作品使歌德感受到古人的文学竞赛挑战。歌德想借用古罗马的哀歌形式表达个人的爱情体验及其时代的性爱观，将主观的性爱体验客观化为对性爱的诗艺体验。歌德擅长靠诗艺把庸俗的日常状况升华到高端的精神层面：在《浮士德》中，浮士德在魔鬼梅菲斯特帮倒忙的情况下庸俗地引诱涉世未深的甘泪卿，甘泪卿悲剧却将这低俗的性引诱崇高化。《罗马哀歌》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歌德 1788 年回到魏玛后感到失望和孤立，不为人理解，故此放弃了《罗马哀歌》大部分组诗的发表。歌德同时代的人多从基督教道德角度反对《罗马哀歌》的性爱主题，其实该作更多涉及诗人的“内心统一”<sup>①</sup>，赞美人可能获得的幸福。施莱格尔兄弟及其浪漫派圈子、席勒、维兰德、威廉·冯·洪堡、科尔纳、克内贝尔等都赞赏该作。1796 年 6 月 25 日，威廉·冯·洪堡致信歌德，称其性爱描写是有严肃性和深度的审美游戏：“爱在您的笔下总显得伟大……与一切有关联，完全自由、纯洁，是完全真实而自然的”。<sup>②</sup>支持者从中看到古代思想与现代思想的综合，看到浪漫派主张的人生整体在艺术媒介中实现。浪漫派作家竭力消除艺术与人生的分离，保守派则一味片面强调组诗的性爱丑闻。卡尔·奥古斯图斯·博伊廷尔(Carl Augustus Böttinger) 1795 年 7 月 27 日致信弗里德里希·舒尔茨(Friedrich Schulz)时说：“所有高贵的女性都对”歌德《罗马哀歌》中表现的“妓院般的赤裸裸感到怒不可遏。赫尔德说得对，他(即歌德)给厚颜无耻盖上了皇帝的印章。《时序女神》的名字应改写成 u。”<sup>③</sup>“时序女神”的德文是 Horen，换成元音 u 后就变成了“妓女”(Huren)，因为《时序女神》刊登了

<sup>①</sup> Karl-Heinz Hahn, „Der Augenblick ist Ewigkeit. Goethes *Römische Elegien*“, in Karl-Heinz Hahn (Hrsg.), *Goethe-Jahrbuch*, Weimar: Hermann Böhlau Nachfolger, Heft 105, 1988, S. 165–180, hier S. 167.

<sup>②</sup> Karl Eibl, „Kommentar zu Goethes *Römische Elegien*“, in Friedmar Apel u. a. (Hrsg.),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Bd. 1, Hrsg. von Karl Eibl, Frankfurt/M.: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87, S. 1095. 为简便起见，下文脚注将法兰克福经典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四十卷《歌德全集》简写为：DKV。

<sup>③</sup> Wilhelm Bode (Hrsg.), *Goethe in vertraulichen Briefen seiner Zeitgenossen*, Berlin: Verlag Mittler, 1918, S. 528f.

《罗马哀歌》。夏洛特·冯·施泰因等贵妇指责组诗涉及性描写,有伤风化。某些贬低有人身攻击之嫌:称歌德描写了自己女友的“美妙玉体”和“女人刺激男人进行的行为”。有人影射歌德固定与女友的性关系是出于担心感染性病。奥地利保守批评家约翰·巴普提斯特·阿尔辛格(Johann Baptist Alxinger)1797年3月25日致信博伊廷尔时说:“令人恼火的是,并非诗人而是魏玛枢密顾问,一个特定的人在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即歌德本人通过《罗马哀歌》“在《时序女神》中,当着全德国的面操练与意大利情妇的房事”。<sup>①</sup>但上述误解者都错误地把抒情诗中的“我”等同于歌德本人。《罗马哀歌》其实“将体验世界与体验层次诗艺地融合于艺术的自我上”,将现实中的歌德进行了“超验处理”<sup>②</sup>,正如奥·威·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所言,哀歌中的性欲“被高贵化了”。<sup>③</sup>席勒为歌德的《罗马哀歌》辩护:“纯粹无邪的自然对体面的法则是陌生的。”<sup>④</sup>恰恰诗人原初单纯自然的气质决定了他是诗人。他还暗示,从道德角度指责歌德《罗马哀歌》的人内心不够纯净。席勒扭转乾坤,改变了当时排斥《罗马哀歌》的接受局面,确立歌德为自然道德的代表。

从整体来看,从歌德同时代人直到20世纪,大胆表现性爱主题的《罗马哀歌》一直经历歌德研究界矛盾的接受历史。因该作的性爱主题,研究界主要持保留态度。另外,研究者一直倾向于试图从歌德的自传角度理解《罗马哀歌》,例如,他们一直在寻找并辨认歌德在罗马的情人,把“哀歌中的我”直接等同于诗人歌德。这种对号入座的研究也屡见不鲜,这显然是研究界始终摆脱不掉的误区:把“哀歌中的我”当成歌德本人,女主人公为福斯蒂娜和克里斯蒂安娜。但歌德研究者又似乎都知道,不能将《罗马哀歌》唾弃为不能接受的作品,而是赞誉它为德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与其古典先辈并驾齐驱,德国讽刺摹仿作品的杰作。与这种矛盾的接受态度相比,恩格斯的积极评价旗帜鲜明:他称歌德通过《罗马哀歌》表现为“真正伟大的、天才的诗人”。<sup>⑤</sup>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至今,研究《罗马哀歌》的视角不断增加,有的从社会批评角度阐释组诗的积极意义,有的侧重分析对比歌德与古罗马哀歌诗人,有的从爱情诗角度分析,有的分析罗马对《罗马哀歌》的意义。有人从宗教与世

<sup>①</sup> 转引自 Dieter Borchmeyer, *Weimarer Klassik. Portrait einer Epoche*, Weinheim: Betz Athenäum GmbH, 1994, S. 185.

<sup>②</sup> Ralf Schnell, *Deutsche Literatur. Von der Reformation bis zur Gegenwart*,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s enzyklopädie, 2011, S. 228.

<sup>③</sup> August Wilhelm Schlegel, „Vorlesungen über Literatur und Kunst, Berlin, 1801–1804“, in Ernst Behler (Hrsg.), *August Wilhelm Schlegel Vorlesungen über Ästhetik I*, Paderborn: Ferdinand Schöningh, 1989, S. 686.

<sup>④</sup> 同注<sup>①</sup>, S. 184f.

<sup>⑤</sup> Friedrich Engels, „Rezension zu Karl Grün, über Goethe vom menschlichen Standpunkt, Darmstadt 1846“, i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Über Kunst und Literatur*, Bände 1–2, Berlin: Verlag Dietz 1967, Bd. 1, S. 457–483.